



## 论孔子的天命、人性及政治价值依据

(2005-6-30 9:21:24)

作者：王杰

孔子天命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他对鬼神的态度问题上。孔子的鬼神思想与其天命思想一样，同样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矛盾。在孔子所处的时代，人们普遍相信鬼神的存在，鬼神迷信思想还是社会上的主流意识形态。由于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切无法解释的现象统统归之为鬼神。那么，应如何评价孔子对“鬼神”的态度？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最容易引起歧义的是两段话：一段是“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有些学者据此来证明孔子具有无神论思想倾向。还有一段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实际上，这两段话并不能证明孔子不信鬼神，由于历史的局限，在孔子时代要做到完全不信鬼神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两段话只是表明了孔子对鬼神摸棱两可的态度而已。孔子对鬼神存在与否采取的是一种非常理智的态度，一种信仰而非拒斥的姿态。他既不盲目肯定，也不盲目否定，既要诚敬严肃不能亵渎，又不可陷溺其中难以自拔，反映了孔子对鬼神的理性的态度，对传统的鬼神文化改造与创新的一面；当然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孔子一直主张，鬼神问题并不是一个容易弄清楚的问题，因此他对鬼神问题是慎之又慎，不随意回答（见《论语·述而》）。对千百年来作为一种人们普遍心理认可的鬼神的存在，孔子在无法证实或证伪的情况下采取了“阙疑”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的实事求是的实证态度。他认为，对待鬼神，最明智的处理方法就是“敬而远之”、“祭神如神在”，这一话语把孔子那种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展露无遗。或许，孔子通过对三代思想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可能已经完全意识到鬼神迷信的不可信，但他为了使自己的思想言论通行于世而又不可能采取非常过激的方式，于是，孔子便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摸棱两可的态度来对待鬼神之事，当季路问事鬼神之事时，孔子不直接给予回答，而是以反问的方式回避了问题，孔子的回答显然不能使季路满意，他更深一层追问：人死之后又如何？孔子仍旧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回答，指出要关注人生之事，而不要一味追究人死之事（参见《论语·先进》）对子路试图通过祭祀鬼神来医治自己疾病的想法也以“丘之祷久矣”（《论语·八佾》）给予了否定。这一模棱两可的话语及态度为后世理解孔子的天命鬼神思想留下了极大的争论空间和思想空间。孔子并没有陷泥于“鬼神”有或无的泥潭，以至避免了像中世纪西欧神学家、哲学家们花毕生精力讨论所谓“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上帝到底是几天把人给造出来的”这类问题的发生，而是让人们首先考虑“人事”上的事情，孔子主张智者应把“务民”之事放在首位，而不可把主要精力放在鬼神之事上。其“敬鬼神”最终落脚于“人道之所宜”，落脚于世俗道德实践上，这正是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奥秘所在。

孔子虽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他认为，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必须保留人们对鬼神的敬仰之情，这是孔子的政治目的使然。孔子作为时代的思想家，作为“时之圣者”，他对天命、鬼神的态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构想和逻辑推演，而是与其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为其现实政治目的服务的。他的天命鬼神思想与其所要建构的严格等级制度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若完全抛弃了天命，抛弃了祭祀鬼神的仪式，就等于抽掉了君臣等级制度的灵魂，这是孔子所不希望出现的事情。所以，尽管孔子怀疑、否定鬼神的存在，但他从政治的角度考虑，仍主张祭祀鬼神，以期达到维护社会和谐与等级制度之目的。

### 三

人性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思想文化中十分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对人性问题的探讨是人类自我觉醒、自我认识的开始。千百年来，对“人性是什么”的问题，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们都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讨。在中国思想史上，先后出现过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超善恶论、性三品论、性善恶混、性善情恶论、性二元论以及性日生论等观点，这些人性论观点都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传统的人性理论。但最早提出人性问题并对人性问题进行阐述的思想家则是孔子。综观《论语》全书，虽然孔子对人性问题讨论得较少，但人性不仅在孔子政治思想体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探究和理解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及特点有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启蒙读本《三字经》中有两句流传甚广的启蒙话语，“人

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两句启蒙话语看似简单朴实，实则隐含着至深至远的哲理，是儒家思想文化基本命题和基本价值观的概括。这句话前半句来自孟子，后半句出自孔子。“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对于孔子的这句话，张岱年先生有一段中肯的说明：“孔子所谓性，乃与习相对的。孔子不以善恶讲性，只认为人的天性都是相近的，所谓的相异，皆由于习。”（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孔子作为“人性”理论的首倡者，既奠定了以后儒家思想中对人性问题叙述和理解的基调，也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这一问题的基本框架。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人性善恶问题，但在《论语·阳货》中仍记载着孔子对人性的最基本见解，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是由于后天环境和教育（“习”）的原因，才使得人性发生了差异和改变。由于孔子没有直接言明人性究竟如何，而此问题又直接关涉到中国政治思想的理论性基础，所以后来的孟子、荀子将人性问题从善恶两个方面做了极端性的发挥。

#### 四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把人类自身的命运构筑在一先验的基础之上似乎是人类在童年时代永远无法超越的鸿沟，是古今中外思想发展史上都存在过的社会历史现象。在人类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时代，对自己或自身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都无法作出合理明确的解释，人类特有的探知未知世界的欲求与对现实世界理解的有限性产生了强烈的矛盾冲突，人类试图对人的一切行为寻求其背后的答案，似乎在人类行为的背后有一股强大的看不见的神秘力量在左右着支配着人的思想行为，这股强大神秘的力量是超越自然和社会的，但又与自然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是自然与社会的终极价值依据和源头。在这种思维意识的支配下，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家们把社会历史领域发生的一切现象都归结为有一种超越性的存在，似乎任何事情的存在都有一终极性的价值本源在支配或左右着。但与西方社会思维路径不同的是，中国政治文化所追求的终极性价值本源并不是超越自然和社会之外的，而是内在于自然和社会的，超越性的价值源头与社会人性之间具有内在的沟通性，成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这种思维模式不仅显见于三代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就是在孔子及其以后的几千年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历程中也一直没有中断过。一般人思想观念中很难超越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孔子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他要使自己的政治理论和主张能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而不显得过分标新立异，他只能采取这种被一般人所认同的思维模式和表述方式。孔子很自然地把其理论与天命、人性联系起来，把那种虚假的存在作为自己理论或政治实践活动的逻辑出发点和终极根据，在孔子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中，尽管子贡说孔子不谈性与天道等问题，（《论语·公冶长》）但当我们深入到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沿着孔子思想发展之轨迹探寻其思想真谛时，仍然可以寻觅到非常明显清晰的逻辑线索。天命论、人性论是孔子政治思想体系的理论出发点和逻辑原点，孔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以仁—礼伦理政治结构模式为核心）是建构在天命与人性的基础上的。如果说天命为孔子政治思想体系建构的外在价值依据，那么，人性则成为孔子政治思想体系建构的内在价值依据。孔子的政治思想体系正是寻找到了具有超越性的两大价值依据，因此，不但具有了超稳定的结构模式，而且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社会与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资源。

[\[第 1 页\]](#)

[\[第 2 页\]](#)

[\[关闭窗口\]](#)